

Zhejiang Reborn

Economic Development Trajectory, 2003-2016

浙江涅槃

2003-2016年浙江经济轨迹

傅白水 ◎著



解读浙江经济发展历程
揭秘浙江凤凰涅槃基因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涅槃

2003-2016年浙江经济轨迹

傅白水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浙江涅槃：2003—2016年浙江经济轨迹 / 傅白水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12(2017.6重印)

ISBN 978-7-308-16455-9

I. ①浙… II. ①傅… III. ①区域经济发展—浙江—
2003—2016 IV. ①F12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5500 号

浙江涅槃：2003—2016 年浙江经济轨迹

傅白水 著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com)

责任校对 吴伟伟 姚嘉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75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455-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那些年的凤凰涅槃

13 年前,笔者求学于南京大学,当时非常喜欢看《扬子晚报》,常常被报纸上琳琅满目的电器广告所吸引。毕业后来到杭州工作,翻阅《钱江晚报》,花样繁多的卖车广告屡见不鲜。更意外的是,尽管当时杭州的城市规模和建设远不如南京,但房价却远超南京。

事实就是如此,凭借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依靠资源要素和资本的双重驱动,浙江经济在 2003—2007 年达到了空前的辉煌。

彼时,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相得益彰,浙江与浙商蜚声海内外。浙江商人成了全国各地政府官员的座上宾,浙江商人在中西部受欢迎程度难以言表,甚至一个挂着浙 C 牌子的小轿车出现在中西部大街小巷都会引起瞩目。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招商团更是天天充斥着浙江大大小小的机场和车站。

这个时期的浙江,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人均收入,经济的各项指标基本都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但请记住,是模式就要衰落,是道路就有尽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浙江任职时指出的那样,要“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浙江经济高歌猛进时,作为市场经济风向标、观察哨的温州却最先感知到了丝丝寒意。2004 年,温州经济一改领头雁态势,增速意外下滑至浙江倒数。先从温州,再到整个浙江,经济发展变得步履蹒跚起来。尤其

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江经济更是陷入增速不断下滑的境地。

浙江试图扭转态势，但一直摇摆于主抓重化工业还是第三产业，纠结于制造业与地产业的此消彼长中，导致“追兵越来越近，标兵渐行渐远”局面的出现。

回顾浙江经济这段艰难探索期，表面上是人口红利消失、资源要素瓶颈、各种成本上升、全球金融危机等多因素共振所致，但本质上却是依靠资源消耗的东亚发展模式率先在浙江走到了历史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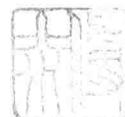
浙江必须转型，唯有涅槃才有新生，“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浙江咬牙坚决推进艰难的转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随着“双十一”、“云栖大会”、“无边界自贸区”和“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纷纷涌现，当下的浙江俨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互联网和新经济中心地带。

是什么力量让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率先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旧有模式呢？答案是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级政府始终遵循市场，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比如阿里巴巴，跑过北京、混过上海，但为什么会在杭州成为卓越的企业？答案只有两个字：市场。草创之初，政府没插手一件事，没给一分钱，只要不违法，随便怎么折腾。因此可以说，阿里巴巴是浙江政府遵循市场的典型产物。

遵循市场，并不代表着政府当甩手掌柜。面对新一轮深改大潮，浙江再次勇立潮头，“五水共治”、“四换三名”、“特色小镇”等，再次将浙江推向了供给侧改革的前沿，这些与国家层面不谋而合的改革，似乎预示着浙江迎来创新驱动发展“崭新的曙光”。

傅白水



目录

□□□ □□

前 言 那些年的凤凰涅槃 /001

|上 部| 空前的辉煌

- 浙江民资“北伐”“西进” /003
- “浙商现象”与“问题富豪” /008
- 又到一年发榜时：富豪们偷税了吗？ /013
- 浙江民企“借壳”造车 /017
- 逐鹿杭州湾：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 /022
- 绍兴“师爷”玩转资本魔方：千亿GDP背后的故事 /026
- 长三角经济天平悄然南倾 /032
- “浙江模式”的两条新路 /038
- 浙江解决农民失地问题的四大模式 /042
- 温州财团组建背后：温州式联合打造非德隆模式 /049
- 浙江民资悄然挺进“垄断禁地” /054
- 中国企业感受道德压力：SA 8000是民工之幸 /057
- 浙江中小民企呼唤职业经理人 /062
- 浙商：中国第一大商帮 /065
- 三张慈善榜浙商占据第一方阵 /071

- 浙江“技术行动”内情 /076
- 鲶鱼效应：浙江国企崛起的秘密 /081
- 品牌建设助推浙江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 /087
- 权力下沉：浙江试点强镇扩权 /094
- 义乌当道 /099
- 浙江地方政改为何能顺利推进 /104

| 中 部 | 艰难的涅槃

- 先发者的感知：温州经济怯步 /113
- 从“温州模式”看原生态民企困局 /119
- 1500亿“逛江湖”，温州民资不炒楼炒什么 /124
- 为浙江民资辩护 /129
- 连环担保一损俱损：一场危险的民企融资游戏 /136
- 浙江民营银行另类“分娩” /140
- 浙江：外资银行与民营银行争夺之忧 /143
- 草根银行的奇迹与困境 /147
- 福布斯排行榜拷问城市发展模式 /153
- 房地产业：长三角崛起的引擎 /155
- 困境凸现浙江如何求变 /161
- 民企平面扩张战略困境 /166
- 中国民企何以成为全球产业链“民工” /170
- 浙江陷入房地产后遗症：工业受制于房地产业 /176
- 浙江产业集群重演意大利式衰微？ /180
- 危机之中浙江经济为何反应最为剧烈 /184
- 全球危机下浙江企业如何走出“生死局” /188
- 民工返城：2009年城市就业现状 /194
- 浙江产业资本困局 /199
- 后危机时代浙江模式期待重生 /203

马云为何产在浙江 /209
浙江经济如何摆脱房地产依赖症 /215
浙江经济发展新动力在哪里 /221
浙江向创新驱动转型 /226
温台嬗变：跨入资本创富时代 /230
浙江如何摆脱“双转移”困境 /233
顶层设计破解浙江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237

|下 部| 崭新的曙光

浙江何以打造服务业强省 /245
从地的“城市化”到人的“城镇化” /250
杭州楼市率先进入“白银时代” /255
领导人与企业家互动背后 /260
深改大潮中浙江的三大机遇 /264
探析海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269
苏浙竞合看未来 /275
尚德与阿里：苏浙模式的代表 /282
特色小镇如何成就浙江大梦想 /284
智慧经济引领浙江未来 /288
宁杭之争谁执牛耳 /292
浙江“创业创新”为何这么火 /296
新土改：探寻新一轮经济发展原动力 /300
后 记 /305

上 部

空前的辉煌

凭借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依靠资源要素和资本的双重驱动，浙江经济在2003—2007年达到了空前的辉煌。

彼时，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相得益彰，浙江与浙商蜚声海内外。浙江商人成了全国各地政府官员的座上宾，尤其在中西部受欢迎程度更是难以言表，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招商团更是天天出没在浙江大大小小的机场和车站。

进入 21 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快速扩张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之中。“蒸笼”还是这只“蒸笼”，但“馒头”已发酵。一边是勃发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形下，一向善赚“全国钱”的浙江人，兴起新一轮的对外投资热潮。

浙江民资“北伐”“西进”

- 如果在西部做个调查：“什么省份的人最受欢迎？”结果很可能是浙江人，更确切说是浙江商人。
- 浙商之所以深受欢迎，是因为他们拥有数千亿元资本。自 2000 年以来，浙江，尤其是温州，在省外的投资猛增，其资金数额之多、投资形式之广、扩张领域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
- 2002 年 9 月，温州民间资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体投资四川巴中和自贡，35 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市签了 35 个项目，共投下 15 亿多元。由一些民企组建的“温州财团”，更是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攻城略地”。
- 在新疆、甘肃、云南等地，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就会出现“浙江村”“温州工业城”“义乌小商品街”。

“你发展，我发财”

——“北伐”与“西进”线路图符合市场发展规律

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浙江民资顺应市场的“北伐”与“西进”线路图。

以浙江为起点，民资“北伐”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在上海建立大本营，以京

沪线为轴心，向苏南挺进，直到北京；接着，在北京建立据点，然后再向东北辐射。“西进”的路线则以长江为轴心，在成都建立大本营；接着，以重庆为据点，再向西部扩展，一直推进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中亚各国的边界。“西进”的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北伐”的多为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企业。

上海、北京、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是浙江民资的密集投放区。在上海，浙商达50多万人，浙籍民企在上海投资总额、企业总数和资产总额，均居全国各省区市之首。浙江人在北京开办的各类企业有上万家，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批发市场、奥运场馆项目、北京凯博尔国际滑水运动场项目等等，都有浙商身影。早在2000年，以温州为主的皮鞋企业开始沿着长江西进，不少企业选择重庆和成都作为投资基地。在四川、重庆、新疆等西部省区市，有300万浙商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号召，“你发展，我发财”，在西部投资办厂。

从流通领域到制造业，浙商的“北伐”与“西进”经历了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并且，投资领域越来越宽，甚至闯进一些“禁区”。

温州民营企业均瑶集团入主湖北宜昌三峡机场，创内地民营企业收购机场之先例。2003年夏季的酷热，使得中国南方频频发生“电荒”，水电站成为具有敏锐眼光的浙商的热门投资项目。作为进军水电站“领头羊”的浙江惠明能源投资公司率先启动了“西进计划”，一举拿下湖北巴东沿渡河流域的梯级开发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16万千瓦，总投资11亿元。这也是湖北省引进的最大的民营水电项目。不到半年，浙江民企投资的水电项目已经遍布湖北、贵州和四川等省，资本多达数百亿元。而在水泥生产领域，浙江就有50亿~100亿元的民间资金在全国游走。

“馒头”大过“蒸笼”

——勃发的创业热潮突破本地人力、物力资源的局限

进入21世纪，众多浙江民企已完成原始资本积累，进入快速扩张期。与此同时，一大批新的中小企业也在成长发展之中。“蒸笼”还是这个“蒸

笼”,但“馒头”已发酵。一边是勃发的创业热潮,一边是浙江当地日益紧张的土地、人才等要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形下,一向善赚全国钱的浙江人,兴起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

“土地是这儿的稀缺资源,温州人均耕地仅有3分多一点。”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说。相关资料显示,工业用地需求的日益增长和耕地保护政策的矛盾在温州越来越尖锐。如瑞安,2002年工业用地需求在1万亩左右,但用地指标只有1500亩。“温州郊县甚至镇上的土地,每亩价格很多已高达25万元左右,超过上海郊区及苏南许多地方的地价。”即使是知名大企业,在温州也面临着用地困难,如著名的正泰集团在温州建的一个工业园,占地也只有区区200亩。这也是浙江人向外拓展的促进原因。

浙江人从来没有停止向外拓展的步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有一半的温州商人外出经商过。同时,随着浙江民企的二次创业浪潮,城市、城镇继续扩张,使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人力、财力、物力的民间流动。外出发展的浙江商人有增无减,形成从人走出去、到资本走出去、再到企业走出去的阶梯式推进。

与此同时,浙江民资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与国家宏观经济战略调整密切相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给急需扩张的浙商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温州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认为,从世界鞋业发展史看,水运和海运对于形成制造业中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加上大陆的广东东莞,这几个曾经的鞋业制造中心的共同点就是出口便利。而中国西部除了具备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外,特别是其交通优势,是中国目前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

“增量”发展还是“存量”逃离

——民资的大量外流会不会导致浙江经济“失血”

随着浙江资本大量外流,有人惊呼:“浙商逃离浙江”“浙江老板携款大

“迁徙”，并因此引起了一场有关浙江经济发展是否会“失血”的争论。

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曾就温州企业外迁和温州资本外移作过专题调查，认为部分企业“外迁”，主要是在外地投资创办新的企业。所谓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而不是“存量”单上的“逃离”。而且，这个“增量”正带动着温州“存量”的发展。比如，正泰、德力西、天正等集团各自在全国投资建立了几百家销售公司。正是有了大量浙江投资的企业存在，全国各地才有了众多经营浙江产品的销售公司和连锁店，浙江的产品也得以顺利地进入全国各地。与此同时，不少浙江企业通过跨地区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壮大了自身。

但一些经济学者和官员却不认同“增量外流带动存量发展”之说。众多浙江民企整体外迁，将所有资产和资本转到外地，企业老板也在外地定居。目前，仅温州一地就有250家民企整体外迁到上海。这不但是资本增量的外移，存量也将随之而去。民资浩浩荡荡外迁，久而久之有可能造成浙江资本与产业的“真空”。

2003年，由《经济日报》等推出的新经济实力排行榜上，浙江新经济的创新能力排在倒数第四位。这说明浙江经济还是以传统经济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浙江经济发展的态势不容乐观。民资大规模的“北伐”和“西进”，给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市的决策层出了道难题。

将“蓄水池”变成“助推器”

——浙江民资流动对各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以上争论只局限在浙江一地，但对于全国来说，浙江民资大规模的“北伐”与“西进”，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疑。

据央行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总额可达8300亿元。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浙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资本“蓄水池”。更进一步，浙江商人的大规模“北伐”与“西进”，无疑将“蓄水池”变成了“助推器”，成为拉动全国经济增长的一

支重要投资力量。据统计,2003年民间资本已占中国社会投资的40%,并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浙江民资在浙江的资本量中已近70%。

同时,浙江民间资本屡闯“禁区”,突破了许多急需开放的新领域,开启了民资投资领域的新天地。仅从长三角新一轮的投资开发来看,浙江民资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浙江民企已从“拾遗补阙”转变成主力军和主力军。2002年,温州的民间资金至少有近10亿元流入上海房地产市场。2003年,浙商在上海的企业有5万多家,总投资规模达500亿元之多。

如果留心浙江的一些主流媒体,你会发现全国各地尤其是安徽、江西、江苏等地的招商广告几乎天天有,如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经济开发区的招商等。在西部尤其是四川与新疆,浙江民资已成为外来资本的最主要来源。而数百亿元资金投资于西部的水电事业,无疑将会从源头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同时,也将极大缓解全国的电荒压力。浙江民资正成为撬动中国能源发展的又一台发动机。

(原载《南风窗》2003年第18期)

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等知名民营富豪纷纷倒下，引发对所谓民企“原罪”的讨论。而在民营企业与民营富豪分布最密集的浙江，富豪落马却不多。这是何原因？

“浙商现象”与“问题富豪”

牟其中、仰融、杨斌、周正毅等知名民营富豪纷纷倒下，令一些人对民营老板投去了质疑和担心的眼神——下一个倒下去的富豪是谁？

然而，在民营企业与民营富豪分布最密集的浙江省，却少见富豪落马案件。

据统计，2002年，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户数等5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在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浙江占174个席位。到2003年6月，浙江省私营企业达28.21万家，个体工商户156.29万户，个私从业人员达718万人。浙江富豪最多，民营老板分布最密集，为何不见“问题富豪”现象呢？假如称其为“浙商现象”，那么它是暂时的、偶然的，还是浙江富豪的确少有问题？

踏踏实实以制造业起家

深入了解牟其中、杨斌、周正毅等发家、落马过程，就会发现，这些落马富豪都是玩“空手道”的高手，大多做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如在房地产业中搞“借鸡生蛋”的捞钱游戏。而浙江的富豪与老板很少有玩“空手道”的，而是靠踏踏实实地发展制造业等发家致富，致力于“养鸡下蛋”。

2003年7月17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2002年度浙江省百强非公(民营)企业名单,百强民企的入围“门槛”为年销售额7.19亿元。在百强中,9家企业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68家企业年销售额逾10亿元。入围的企业绝大多数以制造业为主业,只有17家涉及建筑和被认为容易产生“问题富豪”的房地产行业。但是,在这17家企业中,很少有纯粹的房地产企业,并且这些民企做房地产都非常的严谨与小心,发展得也比较健康。

传统的制造业要求企业实打实地起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壮大。实力不断增强的民营制造企业,成为浙江省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生力军。据时任浙江省经贸委综合处处长的邹成祥介绍,2003年上半年,浙江省500万元以上的制造业投资为619.4亿元,其中民资占2/3以上。

据粗略统计,浙江与江苏目前拥有民间资本过万亿元,其中又以浙江居多,自1995年以来,浙江有7000多亿元民资进入了各个投资领域,居全国之首。民资的充裕使得浙江老板尤其是富豪无须冒风险搞非法集资,或玩“拆东墙,补西墙”的非法借贷把戏。

在浙江,许多以传统行业起家的民企,在经营上还相当保守,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企业负债率较低。如德力西集团,2002年销售额70.56亿元,却只有约1亿元的负债。

低调实在且善积累

许多浙江商人是从很小的商品开始做起的,做鞋子、做纽扣、做五金……钱,一厘厘地赚;事,踏踏实实地做。

2003年的浙江富豪前10位人物创业前大多相当贫寒,鲁冠球打铁为生,徐文荣躬耕田亩,南存辉摆摊修鞋,吴鹰执三尺教鞭,胡成中一介裁缝,楼明出身军旅,李如成是农民,郑元豹是工人,郑坚江是修理工,汪力成是丝厂临时工。不少学者破解浙商的致富“密码”是:没有靠山,白手起家,再加上吃苦耐劳、精于算计的品质。浙江001电子集团的董事长项青松戴的手表才值68元,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一家人曾长时期住在公司的仓库